

[WENHUA LISHI YUYAN]

戴知贤 著

文化·历史·语言

——
戴知贤论著篇章选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文化·历史·语言

——戴知贤论著篇章选辑

戴知贤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历史·语言/戴知贤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1119-069-4

I. ①文… II. ①戴… III. ①文化语言—历史—研究
IV. ①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5985 号

WENHUA LISHI YUYAN

文化·历史·语言

——戴知贤论著篇章选辑

戴知贤 著

责任编辑 张慧芳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32 千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自序

我为什么要出这本书？

这要从共和国 60 周年大庆和本人几十岁大寿说起。30 多年前毕业的我的几位学生和我聊天，建议我出一本书，作为这一“庆”——“寿”的纪念。他们说，重印出版过的著作也行，但必须是自认为最精粹的。我接受了这个建议。

那么，出什么书呢？

于是，我回顾自己的“写作史”。

自 1953 年起，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任教到 1957 年，5 年间，主编过两本（部）中国革命史的资料书，发表过几篇短文。

从 1958 年秋季起，我先后调到人大语文系和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至 1978 年，20 年间，我给很多学生讲授文章分析、文章写作，为他们批改过无数篇作文，帮他们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我自己没有任何著述，也未曾发表过文章。

1978 年，我回到人大中共党史系，研究和讲授“中国现代当代文化思想史”，并带研究生。到 1985 年，我才开始写作专著：1988 年出版了《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文化运动》；1990 年出版了《文坛三公案》、《山雨欲来风满楼——60 年代前期的大批判》；1991 年出版了《大学生研究生论文写作十五讲》；1993 年出版了《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1995 年和李良志一起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一书，并撰写其中部分文章。在此期间，我还参加了胡华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五章“文化

大革命”时期)的编写。此后,我参加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办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大型系列丛书的编审工作,应邀为几部革命史书撰写部分篇章,为几次史学研讨会提供论文……

我回顾自己的写作历程,并对上述论著进行排查。我觉得重印其中任何一本都没有必要,都不合适。我考虑不如确定一个新的题目,然后从上述论著中筛选出与之相关或相近的篇目,把它们编辑在一起。于是我从中挑出10篇,它们都和文化、历史、语言问题有关,便定名为《文化·历史·语言——戴知贤论著篇章选辑》。本书所选的篇章并不都是最精粹的,但它们却是作者花了一番工夫,经过认真研究的。

10篇论著分编为两个部分:前5篇选自专著中的一个或两个完整的专题;后5篇选自专刊中的单篇文章。

这些篇章都选自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选入本书,从内容到文字都未作任何改动。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也许书中的某些提法不够妥当。但这是历史,它带有时代的烙印,反映了作者本身当时的认识水平。本书肯定还有不少缺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自序	1
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	1
上海“孤岛”文化	56
附：“孤岛”不孤——追寻“孤岛”文化史迹	101
60年代前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	110
毛泽东与传统文化	137
论文写作中的语言问题	205

※ ※ ※ ※

《嵊泗渔业史话》序	242
一部别具特色的专业志	
——评《温州市交通志》	244
前辈科学家的政治追求和夙愿	
——读《中共党史人物传》	248
历史研究难点的重大突破	
——初读《重庆通史》	258
“精品”对语言文字的要求	
——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的发言	
.....	266

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①

一、坚持革命的旗帜，开展左翼文化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在文化战线上也聚集力量，组织队伍，开展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和发展革命文化的斗争。

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一方面使用武力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一方面实行反革命的思想文化统治。1928年2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这是一次所谓“统一思想”的会议。它打起“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同心协力铲除共产党的理论”的旗号，企图从思想上和理论上肃清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影响。同年八九月间，蒋介石多次发表讲话，宣称“要拿三民主义统一全国的思想”，“不能容许共产主义存在于今日”。国民党政府在各级学校里实施所谓“党化教育”，重新审查和编著教学用书；建立训导制度，随时调查学生所阅读的书籍和所发表的言论。1929年5月，根据“党治文化”的精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宣传会议”，制定所谓“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决定创作“三民主义文艺”，以抵制“共产党的文艺运动”。国民党中央还制定法令，颁布通令，如《宣传品审查条例》《关于

^① 本文选自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五卷本·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0月版。本文是戴知贤依据他本人所著《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文化运动》一书压缩而成的。该书27万字，于1988年3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各书店之办法》等等，严厉查禁革命书籍和报刊，封闭进步书店和出版机关。总之，革命文化的发展遇到了重重阻力。但是新生的力量是遏制不住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不仅没有被肃清，被禁绝，反而在艰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

创办党刊党报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立即着手恢复和建立党的宣传阵地，创办多种党刊党报，及时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宣传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揭露国民党当局屠杀工农和背叛革命的真相，为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指出继续斗争的方向。

八七会议后不久(8月21日)，中共中央便作出《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提出立即由中央常委会主编出刊《中央通讯》，并恢复出版被破坏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同时要求每个省尽快筹备出版一种机关报，以揭穿反革命派别对本党的污蔑和攻击。

同年10月，中央决定创办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5人组成编委会。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在上海创刊。不久，中央决定扩大编委，由原来的5人扩大到26人，新增了蔡和森、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陆定一、罗章龙、任弼时、李富春等人。《布尔塞维克》坚持到1932年7月停刊，共出版50期。《布尔塞维克》发表了许多专论、社论、评论，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它特辟“我们的死者”专栏，沉痛悼念牺牲的同志，愤怒控诉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暴行。为了彻底驳倒国民党“党义”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理论依据，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上连续发表长篇论文，对国民党宣扬的“三民主义”中的“学理问题”逐项予以批判。他批评了孙中山的唯心史观，批驳了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批评，批评了孙中山的“大贫”、“小贫”思想和否定阶级斗争学说的观点，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那种悲愤、

急躁、复仇的情绪影响之下，思想理论方面的斗争，有时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若干“左”倾盲动主义的色彩。《布尔塞维克》还以相当篇幅批判了改组派、取消派和第三党的错误主张。

192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还出版了《红旗》周刊，后改为三日刊。1930年8月15日起，《红旗》和江苏省委机关报《上海报》合并，改出《红旗日报》。由于屡遭破坏，“日报”未能按日出版。1931年3月以后，改出《红旗周报》。

1931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有关党报及其发行工作的4个文件，规定党的机关报的性质：《红旗日报》为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为中央理论机关报，《实话》为中央政治机关报，《党的建设》为中央关于组织问题的机关报；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的一切领导；由中央组织部发行科筹建全国发行网，做到有统一的计划，全国各重要中心区域建立发行路线，并且开展对苏区的发行工作。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年月里，针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反革命思想文化统治，中共中央创办的党刊党报，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全党继续革命斗争、打破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做出了重大贡献。

组织革命文化队伍

1980年3月，周扬在纪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50周年大会上追溯左联成立的经过时说，大革命失败后，“一大批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者，从北伐前线，从武装起义的战场，从‘革命策源地’，从海外，带着满身尘烟，陆陆续续聚集到上海”。^①这段话概括地描述了当年这批革命文化战士聚集到上海时的战斗英姿和生动情景。

“从北伐前线”回到上海的有潘汉年、钱杏邨（即阿英）、蒋光慈和孟超等几位共产党员。他们从武汉撤退之前，都在全国总工

^① 《人民日报》，1980年4月2日。

会宣传部工作，总工会宣传部长邓中夏和副部长李立三曾鼓励他们成立党的文化组织。汪精卫叛变后，成立文化组织的计划未能实现，党又指令他们分头去上海。1927年底，他们和杨邨人、楼建南（楼适夷）、任钧、殷夫、洪灵菲、戴平万等20多人，成立了文学组织太阳社。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罗绮园，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庵出席了太阳社的成立大会。

从“武装起义的战场”上来的，主要指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从退往潮汕的部队中分别突围经香港回到上海的一批文化人，其中有郭沫若、李一氓、阳翰笙、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等。他们先后接受当时前委负责人周恩来的指示，“在创造社中加强党的力量”，“把党的组织发展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①。

从“革命策源地”来的，主要指成仿吾。他是创造社的元老，1926年6月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他当时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与党组织有密切联系。1927年7月，他借机脱身，离开广州来到上海，并很快与潘汉年取得联系。从广州回来的还有另一位创造社元老郑伯奇。

从“海外”来的，主要指从日本回国的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彭康、李铁声等一批进步青年。他们在日本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和日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团体有较多的接触。他们目睹大革命的失败，认为有必要向中国的知识阶层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和开展宣传工作。1927年9月，成仿吾奉命去日本，逐个邀请冯乃超、李初梨等人回国。于是这批青年怀着满腔革命热情于1927年11月左右回到上海。他们都是创造社的新成员，都在次年9月

^① 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载《左联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记载：1928年4月底，周恩来约见阳翰笙，派他和李一氓到创造社工作，充实和发展这块阵地，开展文艺战线的革命斗争。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以这四方面人员为代表的革命文化工作者的陆续聚集，标志着四·一二后被敌人打散了的革命文化队伍又重新组织起来。这支队伍，既是文学艺术的骨干，又是社会科学的基本队伍。他们决心在革命低潮的形势下，拿起自己所熟悉的笔，在文化战线上摆开阵势，坚持斗争。他们到了上海，立即着手组织社团（如成立太阳社、新思潮社，恢复创造社）、创办文艺的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刊物，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及进步的社会科学新书，发表论战文章，对各种反动思潮和错误言论进行有力的批判。

在他们陆续汇聚的同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也于1927年底从广州到了上海。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论争和对“新月派”错误文艺观的批判，在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和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的关怀和指导下，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主的文学青年与鲁迅以及在鲁迅影响下的部分进步青年，于1930年3月2日，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左联”成立后不久，其他的革命团体也相继成立。3月19日，上海7个剧团组成上海剧团联合会，8月1日，改名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5月30日，一批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学者，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出席成立大会的有邓初民、吴黎平、林伯修（即杜国庠）、朱镜我、王学文、蔡咏裳等40余人。大会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指出社会科学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假马克思主义理论。1930年底，成立了“社联”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从事培养年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接着，美术家联盟（“美联”）、中国新闻记者联盟（“记联”）、中国教育家联盟（“教联”）以及音乐、电影小组等团体也相继成立。这些团体于1930年10月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通过“文总”统一领导各文化团体，由文委书记兼任文总的党团书记，文总党团成员也是文委的成员。这些成员负责

联系他们所属的那个联盟团体的党团工作。根据有关人员的回忆和互相印证,曾经先后担任过文委书记的有潘汉年、朱镜我、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周扬。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决议和指示,经过文委并以文总党团的组织系统下达到所属各联盟的党团组织讨论执行。由此可见,到1930年底,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文化战线上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领导体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社会科学新书的翻译与出版

鲁迅在《二心集·序言》中说:“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①但是就在这白色恐怖中,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不畏强暴,克服种种困难,翻译和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

从1928年到1930年,我国出现了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热潮。据统计,在这3年内,新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就有近40种。^②其中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28年5月,朱镜我译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哲学的贫困》,1928年9月,李铁声译其中的第一、二章,题为《〈哲学的贫困〉底拔萃》);1929年10月,杜竹君译为《哲学之贫困》)、《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928年10月,陆一远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的书名译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29年6月,李膺杨即杨贤江译,书名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费尔巴哈论》(1929年12月,彭喜生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1930年3月,陈启修译)、《自然辩证法》(1930年9月,杜畏之译,题为《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与近代自然

^① 《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页。

科学之发展》)等等。这3年中,翻译出版的列宁著作有14种,其中有:《国家与革命》(1929年中外研究会出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29年刘野平译,书名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两个策略》(1929年陈文瑞译)、《科学的社会主义梗概》(即《卡尔·马克思》,1929年画室即冯雪峰译)、《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1930年笛秋、朱铁笙译)等等。

这一时期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著作,大部分都被译成了中文出版(有的正在翻译中,如《资本论》全书);二是不少著作有两三种不同的中文译本;三是不但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单本著作,而且编译出版了他们的论文集或专题文选;四是不少书店、书局还出版发行了成套的“丛书”。

由于译者的理论水平和外语水平的限制,早期的中译本还很不完善,而且有差错。但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内,翻译出版如此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这些马列主义著作的中译本为处在反动派黑暗统治下的革命者和进步文化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和思想武器。

从1928年到1930年的两三年内,文化界的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还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进步的社会科学新书,例如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李达、王静、张粟合译)、杉山荣的《社会科学概论》(李达、钱铁如合译)。1930年1月,《新思潮》月刊第2、3期合刊上发表的《一九二九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一文,详细评介了这一年的翻译出版情况。文章说,“这一年的出版界,可以说是关于社会科学的出版物风行一时的年头”。文章开列了1929年翻译出版的各种新书151种(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12种);译者100人左右,其中有李达、林伯修(杜国庠)、柯柏年、李一氓、李膺扬(杨贤江)、李铁声、杨东莼、熊得山、李伟森、画室(冯雪峰)、施复亮、林超真(郑超麟)等;出版发行的书店、书局29家。文章还对这一年

的翻译出版情况作了总的概括，指出它有5个特点：一是新兴社会科学已经确立了它的存在权；二是关于经济学的书籍占了大多数；三是唯物辩证法一类书籍的流行；四是关于研究苏联的书籍和关于帝国主义的书籍占了不少数目；五是关于历史方面的书籍（如经济史、革命史、经济学说史、社会思想史等）占了相当的数目。这些特点表明中国思想界已经逐步走上系统研究社会科学的道路。从所列的书目看，上述的概括是真实的，也是相当准确的。

这一时期，革命的知识分子不仅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社会科学新书，而且创办理论刊物，发表论文，或者自己着手撰写专著。例如瞿秋白的《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马克思主义之概念》，李达的《社会主义之基础知识》，张如心的《无产阶级的哲学》，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了通俗的解说或介绍的。1928年1月发刊的创造社创办的《文化批判》月刊以及该刊被查禁之后改名出版的《思想》月刊等，都曾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了《科学的社会主义观》、《辩证法的唯物论》、《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等许多论文。这两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都是1927年底从日本回国的后期创造社的活跃分子。

上述情况表明，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头几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盛况空前。连国民党中宣部也不能不承认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的出版“极一时之盛”，社会科学读物的勃兴，“有风靡一时，汗牛充栋之况”。

在反动政府的严厉查禁下，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反而形成热潮呢？

这是因为大革命失败，中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反动派乘机攻击共产党，诋毁马克思主义，使很多人陷入了沉闷迷惘之中。“中国向何处去？”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理论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有领导地组织一部分党员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1928年党在上海成立了地

下出版社——无产阶级书店，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一些文件。1929年这个书店被封闭，党又成立了华兴书局，继续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和党的重要文件。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革命与考茨基》、《左派幼稚病》、《三个国际》等，都是华兴书店在1930年前后出版的。

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社会科学新书的兴盛，还因为一部分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革命真理的追求，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因而如饥似渴地寻找马列著作，并且努力地把它译成中文。1928年，22岁的郭大力开始翻译《资本论》。他后来回顾说：“我译这部书，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很理解它，也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了翻译的能力。1928年，国民党全面背叛了革命，红色政权已在江西建立。当时我只觉得一点：有革命的需要。”^①侯外庐回忆他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梦寐以求”地翻译《资本论》，“全然出于一种信仰，出于一种责任意识，即中国急需要有一部完整的《资本论》，以填补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之空白”^②。吴黎平在1930年翻译了《反杜林论》。他在“译者初版序言”中说，希望这本书“能够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实际的斗争，有所臂助”^③。上述几位革命者的思想动机是有代表性的。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禁令，自己创办出版机构，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社会科学书籍。1928年11月，李达、邓初民等人在上海创办昆仑书店，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许多书籍，成为30年代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阵地。

① 余信芬、郭宝璜：《郭大力和〈资本论〉》，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8页。

② 侯外庐：《〈资本论〉译读始末》，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

③ 吴黎平：《〈反杜林论〉中译本五十年》，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40页。

马克思主义译著和社会科学新书得以大量出版发行，还有其它原因。国民党反动政权立足未稳，忙于应付军阀混战和内部派系斗争，而且还没有建立像后来那种严密的特务组织，所以，尽管国民党当局接连发布一道道禁令，也确实查禁了不少书刊，但革命文化战士用各种巧妙的方法与敌人的查禁政策作斗争，使书刊得以出版发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有不少书店老板和书商见新兴社会科学书籍销路好，有利可图，便竞相承印和经销这类书籍，有的还专门请懂得外文的知识分子为他们译书，所以也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的现象。鲁迅一方面肯定“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另一方面指出，“大部分是因为市场的需要，社会科学的译著又风起云涌了，较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杂陈在书摊上”^①。正因为有些书店书商以营利为目的，害怕受牵累，遭灾殃，所以当1930年底国民党政府加紧查禁进步书刊，出版马列书籍的热潮就明显地消退了。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文学革命。在五四以后的1923、1924年间，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等早期共产党人就提出了“革命文学”的主张。五卅运动和随之而来的革命高潮，推动了很多文学家的思想革命化。这时候，出现了要求文学表现无产阶级观点、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的呼声。不久开始了北伐战争，革命文学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

大革命失败后，从各地陆续回到上海的创造社成员与原先从事文化和文艺工作的共产党员，认为我们的文学工作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正在这时，西欧各国，尤其是苏联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高涨，给了中国革命作家以启发和鼓舞。于是《创造月刊》从1928年1月的第1卷第8期

^① 《我们要批评家》，《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240页。

起，先后发表了郭沫若的《英雄树》和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文章。1927年底成立的太阳社也在1928年1月出版《太阳月刊》，该刊2月号发表蒋光慈的《关于革命文学》。同时，刚从日本回国的新的创造社成员创办了一个综合性理论刊物《文化批判》，该刊2月号发表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上述这些刊物和文章，从各个方面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主张。

他们强调文学的阶级性，认为“阶级社会里的艺术，都是阶级的艺术”，都为一定阶级服务的。无产阶级文学作为“阶级的武器”，应该为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斗争。他们强调革命文学和文学家的战斗精神，鄙弃个人主义的颓废感伤情绪，认为新文学家不是旧式文人，而是“新生活里的战士”。在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弥漫着白色恐怖，知识界和文学界不少人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失望情绪的时候，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却怀着革命豪情，激励青年看到光明，奋勇前进。《太阳月刊》的《卷头语》写道：“我们也不要悲观，也不要徘徊，也不要惧怕，也不要落后。我们相信黑夜终有黎明的时候，正义也将不终屈服于恶魔手。……我们要战胜一切，我们要征服一切，我们要开辟新的园土，我们要栽种新的花木。”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发出战斗的号召，把大批青年召唤到革命旗帜之下。正因为他们的倡导适应了时代的潮流，所以口号提出以后，便得到了文艺界的广泛响应和支持，一些左翼刊物，如《流沙》半月刊、《我们月刊》、《战线》周刊、《畸形》半月刊、《洪荒》半月刊以及《泰东月刊》等都开展了热烈的宣传和讨论，一时间形成了倡导无产阶级新文学的盛大声势。

创造社、太阳社等倡导革命文学的主张，总的方向和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①但他们有严重的缺点和弱点。他们的主张中，包含着许多不正确的观点：他们

^① 周扬：《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人民日报》1980年4月2日。